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翻译与翻译理论	9
第一节 翻译的本质维度与价值功能	10
第二节 翻译理论的发展历程与类型功能	18
第三节 翻译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	33
第二章 翻译研究与翻译学	38
第一节 翻译研究的对象与方法	39
第二节 翻译研究的发展与翻译学的创立	56
第三节 翻译学学科的未来发展	62
第三章 翻译与哲学	68
第一节 翻译与哲学的关系	68
第二节 翻译研究的哲学途径	74
第三节 翻译哲学研究的未来发展	95
第四章 翻译与语言	101
第一节 翻译与语言的关系	105
第二节 翻译的语言研究与语言学翻译理论	107
第三节 语言学翻译研究的未来发展	115

第五章	翻译与文学	124
第一节	翻译与文学的关系	124
第二节	文学翻译与文学翻译理论	129
第三节	文学翻译研究的未来发展	147
第六章	翻译与文化	154
第一节	翻译与文化的关系	154
第二节	翻译的文化思考与理论探索	160
第三节	文化路径翻译研究展望	171
第七章	翻译与社会	176
第一节	翻译与社会的关系	176
第二节	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视角	180
第三节	社会学视角翻译研究的未来发展	195
第八章	翻译与历史	204
第一节	翻译与历史的关系	204
第二节	翻译史与翻译史研究	209
第三节	“新翻译史研究”展望	225
第九章	翻译与传播	234
第一节	翻译与传播的关系	234
第二节	对外译介与翻译传播研究	239
第三节	翻译传播研究的未来发展	250
第十章	翻译与技术	261
第一节	新技术对翻译的影响	261
第二节	新技术视域下翻译研究及其发展	265
第三节	新技术视域下翻译研究存在的问题与未来发展	274

第十一章	翻译与翻译批评	279
第一节	翻译与批评的关系	280
第二节	翻译批评的理论途径与方法	285
第三节	翻译批评的当下特征与未来发展	298
第十二章	翻译与翻译伦理	306
第一节	翻译与伦理的关系	306
第二节	翻译伦理研究	308
第三节	翻译伦理研究的未来发展	321
第十三章	翻译与翻译教育	325
第一节	翻译的教育问题	326
第二节	翻译教育与翻译教学研究	331
第三节	翻译教育与师资发展	341
第四节	翻译教育研究展望	344
第十四章	口译与口译研究	349
第一节	中国和国际口译研究的概况	349
第二节	口译研究的主题和视角	351
第三节	口译研究的当下特征和趋势展望	372

第一章

翻译与翻译理论

翻译是一项复杂的、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活动，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根据所处理的符号关系，翻译可分为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¹从表现形态来说，翻译可以表现为有声或无声语言符号、有声或无声非语言符号等各类符号系统的选择组合。根据翻译的发生是否通过第三种符号系统，翻译可以分为直接翻译和间接翻译（或称转译）；根据所使用工具与开展方式，翻译可分为笔译、口译、机译，而机译又分为完全机译、人助机译、机助人译；也可以按照其处理的文本体裁特点分为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文学翻译又分为诗歌翻译、散文翻译、小说翻译、戏剧翻译等，而非文学翻译则包括法律翻译、科技翻译、旅游翻译、经贸翻译、政治翻译等。根据目的文本相对于原文本的内容变化，翻译可分为全译和变译，后者又可分为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改译、阐释、译写、参译和仿作等。²翻译最初以口译的方式存在，通晓双语（多语）者为不同语言的人之间的口头交流提供语言转换服务。人类发明文字之后，又演化出了笔译，突破了口译的即时性、现场性和一次性要求，使得人类的跨语言交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时空限制，极大地推进了人类思想的传播、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互鉴。信息化时代以来，翻译的技术工具越来越先进，类型更加丰富，社会参与面扩大，语言转换速度、译作传播范围都在增大，呈现出职业化、专业化和信息化的趋势，翻译的种种变化大大超乎了我们传统的理解。

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在进行着各类翻译实践，也一直在追问着各种有关翻译的问题：何为译？为何译？如何译？等等。人们试图在哲学的意义上弄清楚翻译的现象、要素、方法、本质和功能，由此生产出了系统性的翻译理论知识。

1 语言学家雅各布森（Jakobson）1959年作此划分，分别为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具体见Jakobson, R.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L.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2 黄忠廉于1998年提出了“变译”的概念，用以区分“全译”，此后又不断丰富该概念的阐释，将变译划分为八大变通策略和十二种变译方法。具体见黄忠廉《变译理论》，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

第一节 翻译的本质维度与价值功能

探索事物的本质是人类求知本能的体现。所谓本质，即事物的根本性质，指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无论哪个领域，人们都会追问本领域研究对象的本质。翻译的本质是什么？翻译领域中人们一直探索着这一问题，并在各种有关翻译的论述中给出了多种认识和理解。也可以说，人们对于翻译所做的各种探索和研究，都是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一问题。

一、翻译的多维本质

人们从事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或多或少、或清晰或模糊，都会对翻译本质有所认识。给事物下定义往往是表达对事物本质认识的最直接的方法，不过严格的概念界定却并非我们对翻译本质认识的全部，在未使用“属+种差”的方式确定翻译在相关分类系统中的位置和边界之前，人们更多是以比喻的方式来表达对翻译本质的认识。¹如北宋僧人赞宁说：“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²“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所无也。譬诸枳橘焉，由易土而殖，橘化为枳。枳橘之呼虽殊，而辛芳干叶无异。”³前者意味着，在中国古代译经大师看来，翻译的本质是一项技艺，在改变文本语言形式（左右不同）的同时，保持文本内容不变（背面俱花）。后者则将翻译的本质表达为有与无的交换（以所有易所无）和在不同的环境中培植事物（易土而殖），虽然更换了环境之后，事物的名称发生了变化，但其结构和特性依然保持不变（辛芳干叶无异）。人们还将翻译比作替人耕作的奴隶，⁴或者比作与原文作者竞技表达的人。⁵前者表明，翻译的本质被认为是没有自由、只有义务的语言服务，后者表明，翻译的本质是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与原作相同思想的活动。人们也将翻译比作跳舞、绘画。德莱

1 谭载喜曾对中西文献中的翻译比喻进行了梳理和分类，他一共收集了10个类别共计270条有关翻译的比喻，其中西方语言的156条，汉语的114条。他对翻译比喻的分类统计具体参见谭载喜《翻译比喻衍生的译学思考》，载《中国翻译》，2006年第2期，第3-8页。

2 赞宁《译经篇总论》，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88页。

3 同上，第92页。

4 德莱顿还做过这种比喻，他说“...slaves we are, and labor on another man's plantation; we dress the vineyard, but the wine is the owner's: if the soil be sometimes barren, then we are sure of being scourged; if it be fruitful, and our car succeeds, we are not thanked; for the proud reader will only say, the poor drudge has done his duty...”具体见Dryden, J. *Steering Between Two Extremes*, 1697。

5 原文为I would not have our paraphrase to be a mere interpretation, but an effort to vie with and rival our original in the expression of the same thoughts。具体见Quintilian, 96? AD, *Institutes of Oratory*, excerpted i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ohn Selby Watson。

顿 (John Dryden) 曾说翻译就像戴着脚镣在绳索上跳舞。¹ 这表明, 他认为翻译的本质是受约束、追求平衡和审美的活动。郑振铎说: “译文学书的工作就不同了: 他所用的不是与原作同样的颜料, 但却要他的画图有与原作同样的力量与效果。”² 傅雷也曾说: “以效果而论, 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 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³ 这表明, 在郑振铎和傅雷看来, 翻译的本质在于以不同的语言材料 (颜料) 来使译作呈现出与原作相同或相似的感染力和美学效果。人们还将翻译比作中间人和媒婆, 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认为译者是人类普遍的精神交流中充当调解人的人, 以推动交流作为自己的使命。⁴ 茅盾曾指出有些译本不免是“说谎的媒婆”, 然而“真正精妙的翻译, 其可宝贵, 实不在创作之下”。⁵ 钱锺书也说: “……翻译在文化交流里所起的作用。它是个居间者或联络员, 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 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 仿佛做媒似的, 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因缘’。”⁶ 这说明, 在歌德看来, 翻译的本质是居间、调解和推动人们精神交流的活动, 而在茅盾和钱锺书看来, 翻译的本质是在互不了解的双方之间进行介绍和调谐, 使不同文化的人们走向彼此、接纳对方, 缔结良好关系。总之, 古今中外有关翻译的比喻可谓形形色色, 难以胜数, 体现出人们对于翻译本质丰富多彩的认识。

除了各种生动的比喻之外, 人们还以其他方式来表达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如唐朝贾公彦在《周礼义疏》里提到“译即易, 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⁷ 这一言简意赅的定义表明, 在我国古代, 人们认为翻译的本质在于转换语言使交际双方达成相互理解。20世纪后半叶以来, 中外译学理论工作者对翻译的属性作了更多的探索, 学者们分别从语言学、符号学、传播学、社会学、文化研究、文艺美学、系统论、信息论来考察翻译, 有的将翻译视为科学, 有的将翻译视为艺术, 有的强调翻译是一种复制, 有的强调翻译是一种改写, 有的认为翻译是再创造, 有的认为翻译是意义阐释, 有的说翻译是文化传播, 还有的说翻译是政治操控。有关翻译为何的陈述纷纭芜杂, 翻译定义也层出不穷。这些陈述反映出不同阶段不同路向的翻译研究所关注的不同要素, 也反映出人们对翻译日渐深入多元的认识。翻译本质的多维属性也越来越多地获得译界学者的认同: 高玉提

1 原文为[Translating is] much like dancing on rope with fettered legs。具体见Dryden, J. Preface to Ovid's Epistles, 1680。

2 郑振铎《译文学书的方法如何?》, 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修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年, 第452页。

3 傅雷《〈高老头〉重译本序》, 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修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年, 第623页。

4 原文为That is how we should look upon every translator: he is a man who tries to be a mediator in this general spiritual commerce and who has chosen it as his calling to advance the interchange。具体见Goethe, Extract from Writings on Literature, 1824。

5 茅盾《“媒婆”与“处女”》, 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修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年, 第423页。

6 钱锺书等《林纾的翻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年, 第268页。

7 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修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年, 第1页。

出了“翻译本质‘二层次’论”，¹许钧归纳了翻译的五个方面的本质特征：社会性、文化性、符号转换性、创造性、历史性，²谭载喜认为翻译是具有绝对和相对双重属性的活动。³学界越来越达成共识：翻译的本质是一个由多种维度特性所构成的复杂性存在，它在不同历史阶段以不同的现象或面貌呈现，既有着“一般本质”和“特殊本质”的层次之分，又有着“范畴”与“类属”的多元归属。从某一层面或从某一角度去剖析翻译的本质，它始终呈现出“亦此亦彼”的多维性。

最常见的翻译定义一般是从内容与表现形态对翻译本质进行描写和界定，如：“用一种语言（译语）的等值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原语）的文本材料”⁴“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即话语）在保持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外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⁵“翻译是从语义到文体，用贴近的自然对等语在接受语中再现源语信息”。⁶上述三种定义关注的核心是翻译活动的具体内容，回答翻译是“做什么的”的问题。从这一角度来看，翻译的属为“语言转换”（上述定义分别为“文本材料替换”“改变言语产物”和“再现语义文体信息”），这与传统译论所说的翻译即“易”“移”同出一辙。语言转换涉及源语和目的语，因而目的语文本对源语文本的“意义忠实/对等”就成了判断这种活动的标准，上述三种定义中分别以“等值”“保持意义不变”和“自然对等”来表达。虽然从内容角度定义翻译有各种不同的表述，但大致可以概括为“翻译是将源语文本转换为意义对等的目的语文本”。此类定义突出原文的第一性，而以译文为第二性，为人们的翻译实践提供了原则指导，对我国翻译学习者和研究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此外，学者们还从功能维度来认识翻译的本质。如：“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际的信息传播和交际活动”⁷“翻译是设法将一种语言所传递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跨文化交际行为”⁸“翻译是语际之间的信息传递和语族之间的文化交流”。⁹这三个定义中共同的要素是语际之间的信息传播/传递与文化之间的交际/交流，其关注点不在原文如何转换为译文，也不以“忠实”或“对等”来加限定，而将翻译研究引向翻译所要达到的目的与功能——信息传播与文化交流。和功能定义“语言是人类思维和交际的工

1 高玉《翻译本质“二层次”论》，《外语学刊》2002年第2期，第81-84页。

2 许钧《翻译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9-74页。

3 谭载喜《翻译本质的绝对与相对属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5页。

4 原文为Translation is the replacement of textual material in one language by equivalent textual material in another language. 具体见Catford, J. C.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20.

5 巴尔胡达罗夫《语言与翻译》，蔡毅等编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第4页。

6 原文为Translation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 langu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 具体见Nida, E. A. & C. R.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Leiden: E. J. Brill, 1969, P. 12.

7 吕俊《英汉翻译教程》，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页。

8 杨大亮、张志强《翻译本质再认识》，《上海科技翻译》2001年第3期，第10页。

9 萧立明《新译学论稿》，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第5页。

具”“螺丝刀是一种用来拧转螺丝钉以迫使其就位的工具”一样，上述三种翻译定义也是从功能维度（即翻译是用来做什么的活动）表述对翻译本质的认识。

不同的定义体现不同的翻译观，从形态维度界定翻译的研究者自然倾向于从原文意义出发，重点考察翻译过程中的语言要素，力图揭示和把握翻译活动中如何忠实于原文意义的语言转换规律。从功能维度界定翻译的研究者则会更多地考虑如何实现翻译的社会文化功能，研究如何针对受众实际情况对翻译全过程进行控制以达成有效的信息传播与文化交际，其研究对象自然会扩大到翻译中语言之外的文化要素。

正是由于从不同角度对翻译进行考察，人们获得了对翻译本质更多维度的认识，翻译研究范围才得以扩展，内容才获得深化。学科理论建设的过程也是学科基本概念发展的过程，翻译学的学科发展无不得益于学界对翻译这一基本概念逐渐深化的探索。译界学者不断改写翻译定义，不仅修改某一维度翻译定义的表述方式，还将不同维度结合起来，取得了创新的理论认识。如许钧给出了翻译的定义：“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¹该定义将翻译活动的形态维度和功能维度结合在一起，既保持语言符号转换以再现原文意义的内容描述，又不失对跨文化交际的效果考量。同时，该定义以“意义再生”作为翻译活动的任务，并没有设置“忠实”或“对等”等无法操作的标准，增强了该定义对翻译现象的概括力和解释力。将两种维度结合起来考察更是将翻译的诸多要素连接了起来，帮助构建了翻译研究点线面组合的结构。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活动的发生与条件维度来认识翻译的本质。翻译为什么会发生？翻译的发生需要什么样的条件？翻译之发生是因为存在社会需要，以及有可以满足这种需要的主体。当人们在文化信息传播与交际过程中存在因语言符号系统差异而产生的理解障碍时，就产生了翻译的需要。从这个角度可以清晰地看到翻译的性质——为交际参与者解除异语理解障碍而提供的一种劳动。易言之，翻译是以劳动的形式满足他人特殊需要的活动。这种由一方向他方提供的有偿或无偿的活动就是服务，因为服务是“能产生有价值的利益或满足的活动，而这些活动是服务消费者本身难以完成或不愿意去完成的”。²因而，从这一维度来看，翻译的本质是一种语言服务，其服务的对象是跨语交际者，服务的目的是帮助达成有效的跨语信息传播或跨文化交际，服务的方式是进行语言符号转换或符号阐释，解决异语符号理解与表达困难。³

其实，对于翻译的服务本质，人们早已有认识。译学界所熟知的翻译比喻，如“一仆二主”“奴隶”“仆人”“媒婆”等，都是对译者工作——尽力提供好服务的写照。方

1 许钧《翻译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5页。

2 冯俊、张运来《服务管理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0页。

3 蓝红军《何为翻译，关于翻译定义的第三维思考》，《中国翻译》2015年第3期，第29页。

梦之曾给出的定义“翻译是按社会认知需要，在具有不同规则的符号系统之间所作的信息传递过程”¹也揭示出翻译是为满足社会认知需要而开展的。现实生活中，翻译服务早已不是新词，目前众多翻译企业通过提供翻译服务而创造着巨大的价值与利润，基于翻译形成的语言服务业正蓬勃发展。理解了翻译本质是一种服务，也就不难解释翻译的职业化、产业化和技术化发展现象了。基于翻译的服务本质，可以建立起一组新的概念体系：翻译服务需求、翻译服务行为、翻译服务产品、翻译服务提供者、翻译管理、翻译产业等。其中翻译服务需求是翻译服务行为的起点，翻译服务行为须按照服务对象的需求开始、进行和结束，翻译服务行为不以是否忠实再现原文意义为评判标准，而以特定环境下手段与方法选择的合理性为尺度，翻译服务产品是以翻译劳动成果为主导的产品组合，笔译通常以实物形式（译文文本）呈现，口译通常以非实物形式（口译过程）呈现，对翻译服务产品评价主要考虑满足顾客需求的程度和翻译产品生产的成本。翻译服务提供者可以是译者，但不限于译者，更多是以经营翻译产品为主的组织机构。翻译管理指翻译企业或其他翻译机构为保证翻译服务产品质量，提高翻译服务产品生产效率而对翻译生产过程进行的优化与控制。翻译管理需要集成整个组织翻译产品生产过程中涉及的独立人员、内容系统和语言资产，可以分为内容管理、过程管理和资源管理等。翻译产业是指经营翻译产品的翻译服务提供者的集合。

从“语言符号转换”，到“文化信息传播”，再到“语言服务”，不同的翻译本质观将翻译研究的关注点由原文解码、意义提取、译文编码、意义再现的过程，导向了原作者、译者及译作读者的文化语境、文化地位、文化心理、现代性身份建构、意义阐释、信息丢失与弥补等，再扩大到翻译职业教育、行业规范、译者能力、市场需求、翻译技术开发、翻译管理等方面，翻译的评价标准也由单一的译文忠实通顺，发展到了译文忠实通顺、翻译行为合理和翻译用户满意三者结合。可以预见，随着人们对翻译认识的发展，我们还会揭示出翻译更多维度的本质特征。

二、翻译的多元价值

翻译的价值涉及主客体关系，与译事、译文、译者不能分割。如前所述，翻译的价值和功能就是翻译本质的维度之一。人们除了追问“何为译”之外，还一直追问“译何为”的问题，即翻译在哪些方面发挥了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翻译应该有何作为等。许多中外早期翻译文献中都包含了对翻译之用的朴素认识，将翻译比作“信使”“媒婆”“桥梁”也无不体现出人们对翻译的价值定位。在诸多翻译史论著和翻译家研究成果中，对译者所做贡献的评述也往往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过，直到20世纪90年代，翻译的

1 方梦之《翻译新论与实践》，青岛：青岛出版社，2002年，第4页。

历史和文化价值问题才成为重要的译学论题。尼兰贾纳 (Tejaswini Niranjana) 认为翻译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远没有被人们所认识, 她在1992年出版的《为翻译定位: 历史、后结构主义和殖民语境》(*Si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一书中对翻译在殖民语境中所起的实际作用进行了研究。¹ 1995年法国学者德利尔 (Jean Delisle) 和伍兹沃斯 (Judith Woodsworth) 联合主编的《历史上的译者》(*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 一书“从字母的发明、民族语言的形成、民族文学的发展、知识传播、权力关系、宗教传播、价值观念传播、词典编纂及口译员的历史贡献等角度, 描述并探讨了历史上重要译者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² 我国学者王克非于1997年出版的《翻译文化史论》也重点研究了“翻译对于文化 (尤其是译入语文化) 的意义和影响”。³ 孟华则指出翻译是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影响因素, 她认为翻译“可在一国的文化传统中, 亦即在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中植入相异性因素”,⁴ 即翻译通过“归化”策略传递“相异性”, 从而渐进性地更新译入语文化传统, 积累性地丰富译入语文化。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 也认为, 翻译的每一个环节都会打上本土文化的印记, 而另一方面也对本土文化和政治产生着形塑性的影响, 他在《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一文中通过具体的案例揭示出翻译是如何塑造和维持特定的文化身份的。⁵ 他强调翻译的影响和作用可以从民族的层面考察:

翻译有助于塑造本土对待异域国度的态度, 对特定族裔、种族和国家或尊重或蔑视, 能够孕育出对文化差异的尊重或者基于我族中心主义、种族歧视或者爱国主义之上的尊重或者仇恨。从长远来看, 通过建立起外交的文化基础, 翻译将在地缘政治关系中强化国家间的同盟、对抗和霸权。⁶

许钧是最早对翻译价值进行系统论述的学者。他从翻译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语言价值、创造价值、历史价值五个方面, 详述了翻译的交流、传承、沟通、创造、发展等功能。许钧指出, 翻译的社会价值, 即翻译对社会交流与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 重

1 T. Niranjana, *Si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2 姚斌、王炎强《〈历史上的译者〉(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 介评》, 《翻译界》2018年第1期, 第119页。

3 许钧《翻译论》,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6年, 第20页。

4 孟华《翻译中的“相异性”与“相似性”之辩——对翻译与文化交流关系的思考与再思考》,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编《多边文化研究》,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1年, 第101页。

5 L. Venuti, *Transl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ies*, in *Cultural Functions of Translation*, eds. Christina Schäffner & Helen Kelly-Homes,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99, pp. 9-25.

6 韦努蒂《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 查正坚译, 刘健芝校, 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年, 第359-360页。

在交流；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翻译在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重在传承；语言价值体现在翻译活动对语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重在沟通；创造价值主要体现在翻译于社会、文化、语言等的创新作用，重在创造；历史价值表现在翻译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贡献，重在发展。¹ 许钧的论述有助于建构我们的翻译价值共识，为我们从功能角度认识翻译本质提供了理论参照。

正如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对翻译价值的认识不可能达至终极。事实上，对这两者的认识总是相辅相成的，对翻译本质的认识是历史的、发展的、多维的，对翻译价值的认识亦然。翻译价值可以从各种角度来考察，按相关主体的类型，可以体现于个体、国家和人类社会等不同的层面。

首先，翻译对于个体有着多重价值。翻译活动所关涉的重要个体有译者、原文作者和读者等。译者可以通过翻译获得报酬收入、知识收获、审美体验和精神享受。余光中曾写出这样的感受：“翻译的境界可高可低。高，可以影响一国之文化。低，可以赢得一笔稿费。”² “幸福的译者得与一个宏美的灵魂朝夕相对，按其脉搏，听其心跳，亲炙其阔论高谈，真正是一大特权。译者当然不是莎士比亚，可是既然译笔在握，就可见贤思齐，而不断自我提升之际，真正超我之凡，而入原著之圣。……这就是译者在世俗的名利之外至高无上的安慰。”³ 其中，“稿酬”“幸福”“与一个宏美的灵魂相对”“特权”“不断自我提升”“世俗的名利之外至高无上的安慰”等，表明译者可能通过翻译获取各种物质利益和精神价值。对原文作者而言，翻译的影响当然不可小觑。翻译使原文获得新的生命，获得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关注，不少作者也因此获得更高的报酬、地位和名声。历史上通过翻译从边缘走向经典的作者（作品）并不少见，因翻译成为世界文学的作品也不胜枚举。例如在中国不太为人所知的寒山诗，经翻译之后在美国大受欢迎，反过来在国内也获得了更多的关注。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翻译为其作品带来的世界性的影响。对读者、受众而言，翻译的价值更不容忽视。翻译给读者展现了全新的世界，带来了知识的增长、新异的体验和感受，也带来了精神的提升。当然，读者感受到的翻译价值也因翻译的文本、体裁、视角、策略、译文质量而各异。在不同的读者眼中，典籍文本和普通文本翻译的价值必然存在差异，文学翻译和科技翻译在审美价值和经济价值上有明显的区别。

其次，对于国家而言，翻译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这些价值覆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语内翻译是一个国家文化实现历史传承的必经途径。比如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两大支柱的儒家和道家，从开创到后期经历多次

1 许钧对翻译价值的论述主要参见许钧著《翻译论》（第7章），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

2 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第147页。

3 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第177页。

转型，无论是依照“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都是凭借不断的语内翻译和阐释得以流传至今。语际翻译，尤其是从外语译为本国本族语言，则是引进新知识、新思想、新技术，丰富、革新现有之物，创造前所未有之物的常用途径。晚清时期的中国，因受鸦片战争重创，一些有志之士意识到必须通过翻译“师夷长技以制夷”，梁启超等人明确提出的我国需要引进翻译的选材有“算学，电学，化学，水学”“章程之书”“教科书、政法、史书、蓝皮书（类似年鉴）、农学、矿学、工艺及商务等类”“各国时政”“居官者考订之书，如行政治军、生财交邻等”“外洋学馆应读之书，如历史、数学、植物学及矿物学等”。¹ 在文学领域，一个国家的文学处于草创期，或边缘、弱小状态，或者处于危机、转折期时，输入的翻译文学就要起关键的作用。² 除了从外语译为本国语言，一个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可以通过主动外译营造友好的语言环境，吸引国际客商前来旅游、工作或投资，或通过外译建构自身形象、争取平等对话、维护民族身份和文化多样性。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翻译一直都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翻译是文化启蒙的手段：从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直到改革开放之前，翻译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工具。改革开放以来，翻译是我们向世界开放的窗口；而在当下，翻译则是重绘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学之版图的方式。³ 翻译使得中国更接近世界，也使世界更为了解中国。

最后，翻译对于人类社会有着非凡的价值。站在整个人类发展的角度看，翻译对于生产、传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成果，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维护世界稳定和持久和平，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⁴ 在西方文明史上，希腊人通过翻译从巴比伦文明中“学到了数学、物理学和哲学，犹太人学到了神学，阿拉伯人学到了建筑学”。⁵ 《历史上的译著》告诉我们，没有翻译就没有哥特语字母表、亚美尼亚语字母表、格拉哥里字母表、西里尔字母表、克里语字母表的产生。⁶ 绵长的中西译经史显示，影响欧洲文化的《圣经》“根本就是一部大译书”，可以说“没有翻译就没有基督教”。⁷

概言之，翻译之用大矣！翻译影响和改造语言和文化，如佛经翻译对于汉语词汇、语法和文学形式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翻译影响社会的政治思想与意识形态，如翻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历史规划与主体召唤的巨大作用，从而塑造了现代中

1 谢天振、何绍斌《简明中西翻译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第117页。

2 Even-Zohar,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ed. L. Venuti,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192-197.

3 王宁《翻译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作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第3页。

4 许钧《翻译概论》（修订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年，第215-217页。

5 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6 J. Delisle & J. Woodsworth, *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 (Revised editio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12, pp. 3-22.

7 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第148页。

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翻译参与建构民族身份，如大英帝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时期，翻译以本土的政治和文化价值为取向，把不利于本土文化的争论和分歧排除，强化了殖民统治的合理性，从而既构建了殖民者的民族身份，也建构了被殖民者的民族身份。当前，翻译之用如何强调都不为过。我们需要翻译，以更全面地了解国际形势和发展趋势，洞察国际竞争和事件的背景，从而及时做出反应。我们需要通过翻译来学习借鉴国外科技领域的先进经验和成果，推动科技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接受，提升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我们需要翻译来丰富和发展本国语言，维护语言安全，也需要翻译来向外宣传本国的传统和当代文化，促进文化交流，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第二节 翻译理论的发展历程与类型功能

任何学科都有自身的理论追求，翻译学在当今学科图谱中占据一席之地是与其理论成就密不可分的，正是翻译理论总结和概括了翻译研究所揭示的有关翻译的种种内容，进而深化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但由于翻译学新生不久，许多人（包括翻译界内人士）对翻译理论的认识还较为模糊，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互相疏远的情况并不罕见。我们经常面对这样的问题：翻译需要理论吗？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有什么关系？翻译理论有用吗？翻译理论有何用？等等。这些问题可谓由来已久，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上海翻译》曾于2003年发起了一次有关翻译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大讨论，许渊冲、杨自俭、孙致礼、郭建中、王宏印、吕俊、王东风、张经浩、毛荣贵等人参与讨论，共发表论文18篇，该讨论构成了翻译学科发展史上的一个事件。¹十多年之后，该刊于2019年再次组织学者对此进行回顾与反思，希望进一步澄清对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认识。这些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大大推进了人们对翻译理论的认识。但究竟什么样的理论或知识才是翻译理论？翻译理论经过了怎样的发展过程？有哪些类别、来源、形式、内容和功能？这些问题依然值得年轻学者们思考和回答。

关于“理论”的定义和表述，正式、权威的几乎数以百计，非正式的更是数不胜数。²我们通常将理论理解为由实际的实践中归纳出，或由观念推演而得到的有系统、有组织看法或论点。根据《关键词：文化与社会词汇》（*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一书收录的词条描述，“理论”一词来自希腊文和后期拉丁文，14世纪英语写法为theorique，16世纪为theory，意为“思考”（contemplation）“景象”

1 许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概论（1978—2018）》，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64页。

2 曹伟《理论概念反思与应用性社会科学研究逻辑重构》，《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第13页。

(spectacle) 和“思想观念”(mental conception), 17世纪可意指“景象”(spectacle)“经深思之见”(a contemplated sight)“(观念)谱系”(scheme [of ideas])和“解释体系”(explanatory scheme)。“理论”与“实践”在17世纪时开始区别开来,但两者并不对立。¹皮姆(Anthony Pym)在《翻译理论探索》(*Exploring Translation Theories*)一书中也提到,“理论”一词可能来自希腊语theā和-horan, theā为“视角”(view), -horan为“看”(to see),即从某个视角去看(to theorize is to look at a view)。²张佩瑶(Martha Cheung)追溯了汉语中“理论”的来源,发现“理论”大约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译自日文(riron),她认为“理论”最初引入时,主要表达的是“争论”或“论事物之理”的含义,与古代早已有的“理”的解释(道理、理性、义理)较为一致,并没有后来我们熟悉的各大词典对理论的释义。这意味着理论“原本只是代表既存思维模式和观念的术语,突然被赋予代表不同思维模式和观念的新责任”。³

译学界对翻译理论也给出了各种各样的定义。黄振定将翻译理论界定为“翻译实践的经验总结和规律化、系统化”。⁴黄忠廉认为翻译理论是“从翻译中概括出来的系统的知识和原理”,⁵形成于“产生感性认识”“确立翻译思想”“验证翻译假说”三个步骤之后。⁶曹明伦则指出翻译理论是从翻译“这项活动中概括出来的对其发生、发展、过程、结果、功能、影响以及活动参与者(包括译者和与这项活动相关的其他行为主体)的系统化的理性认识”。⁷从各种定义中,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有关翻译理论的共识:1)翻译理论是对翻译的经验概括;2)翻译理论是对翻译认识的表述;3)翻译理论是由概念、范畴和命题组成的系统。

翻译理论的陈述系统可分为事实陈述与价值陈述。首先,翻译理论是对人类社会中存在的翻译相关事实的描述、归纳和概括。作为翻译理论的认识对象,人们的翻译实践活动、各种翻译现象、翻译服务产品等都是外在于研究主体的事实存在,翻译所涉的环境、译者、译作、读者等要素,甚至是译者的翻译认知心理、情感与价值观念等主观性因素一旦成为研究对象也是一种事实存在。如“翻译是艺术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活动”就是对作为事实存在的翻译现象的一种描述。但与自然科学不同,翻译理论的对象内容是社会经验事实,而非自然事实,这种事实必定包含观察者的价值因素。因为作为“观

1 R.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249-250.

2 A. Pym, *Exploring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 1.

3 M. Cheung, From “Theory” to “Discourse”: The Making of a Translation Anthology,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003(3), P. 398.

4 黄振定《翻译学——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2页。

5 黄忠廉《翻译思想≠翻译理论——以傅雷、严复为例》,《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第79页。

6 同上,第80页。

7 曹明伦《翻译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再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上海翻译》2019年第6期,第2页。

看”的理论受限于主体的价值差异，所以“没有一个理论能完全反映所有的真理，一切理论都是由人根据既定的意图去创造和构建的”。¹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翻译理论也是一种价值陈述，只代表观者的视角，并不全然反映现实。

一、中西翻译理论的发展历程

要认识翻译，离不开认识翻译的历史，离不开认识翻译理论的历史。回顾过往，勾勒翻译理论发展的线索，了解不同历史时期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把握人类翻译知识形成的历史背景，才能更好地认识翻译的本质，让翻译更好地服务社会的需要。

（一）西方翻译理论的历史发展

译学界普遍认同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是西方翻译理论的奠基者，是第一个阐述翻译过程、提供最佳处理方法建议的人，²自他开拓了翻译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园地之后，西方翻译理论史“被一条延绵不绝的线贯穿起来”。³西塞罗区分了“作为解释员的翻译”和“作为演说家的翻译”，前者指注重字词对应的翻译，后者指追求译文对目标读者所产生的效果的翻译。他推崇后者，赞成创造性的自由翻译，反对逐词死译，认为译者在翻译时应像演说家那样，使用符合古罗马语言习惯的语言来表达外来作品的内容，以吸引和打动读者、听众的感情，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巨大。⁴其后，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等继承和发展了西塞罗的观点，由此“开创了西方翻译史上文艺派的先河，并在翻译理论以后的发展中形成了一个特色鲜明的传统”。⁵

但早期西方学者并非都主张意译，一些神学家认为，《圣经》的神圣性要求翻译只能恪守原文意旨，不能变通与创造。斐洛（Philo Judaeus）就是其中一位代表。他认为翻译的首要条件是要有“神的感召”，只有虔诚的教徒才有资格翻译《圣经》，且只能采用字字对应的直译。斐洛的直译理论在神学领域影响深远，直到三百多年之后哲罗姆（St. Jerome）和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才将之进行了修正。哲罗姆区分了文学

1 文军《何为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学理论为何——兼论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反思》，《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68-74页。

2 D. Robinson,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 (2nd edi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 7.

3 谭载喜《翻译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3页。

4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1页。

5 谢天振《中西翻译简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第266页。

翻译和宗教翻译，认为两者有不同的使命，有不同的原则和方法，文学翻译应多采用意译，而《圣经》翻译则应以直译为主。奥古斯丁则从“名实之辩”的角度论及翻译，他完全赞成直译，要求翻译立足于作为基本单位的词语，把握符号形式与实际内容的关系，以忠实为根本。¹ 奥古斯丁的翻译理论具有开创性的符号学意蕴，他把概念意义和语言符号区别开来，还注意到了读者需求的差异，强调根据读者需求调整翻译风格，他所论述的主题除了翻译方法之外，还拓展到了翻译单位、译者资质、翻译风格等。

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之后，西方翻译理论呈现出新的局面，出现了专门论述翻译的文章，理论见解丰富。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认为翻译必须尊重原作，译者必须具有丰富的语文知识，风格是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风格的性质取决于读者的需求。² 路德（Martin Luther）也是这一时期卓越的翻译理论家，他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倡导我们今天所说的读者导向，³ 认为翻译必须采用人民的语言，必须注重语法和意思的联系。⁴ “法国译论之父”⁵ 多雷（Etienne Dolet）则提出了要做到出色翻译的具体要求，包括译者的资质条件和翻译中的语言表达方式。他从自身民族语言发展角度来考虑翻译中的语言表达，被认为是西方翻译史上第一个真正建构了翻译理论的人。⁶ 查普曼（George Chapman）和富尔克（William Fulke）是这一时期英国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查普曼坚持以诗译诗，主张译文要有文饰，尽量表明作者的意图，⁷ 他对译诗原则的讨论“填补了16世纪特别是后期翻译理论的某些空白”。⁸ 富尔克的理论成就主要在于对《圣经》翻译的新见解，他认为译者的力量在于其语言能力，而不在于是否信仰上帝，认为翻译必须采用最易于人们理解的词语和表达。⁹

17至19世纪，英国出现了以翻译理论闻名于世的学者和系统全面的翻译理论专著。德纳姆（John Denham）、考利（Abraham Cowley）、狄龙（Wentworth Dillon）围绕诗歌翻译应忠实于什么和达成忠实需要什么条件的问题，提出了诸多理论见解。德莱顿最早提出翻译是艺术的观点，也最早将翻译按照方法划分为三种类型。他的创见涉及翻译本质、翻译方法、译者伦理和翻译的语言观等，系统化程度超过了以往的学者，可谓“独

1 黄振定《翻译学：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7页。

2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60-63页。

3 D. Robinson,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 (2nd edi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 84.

4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64-68页。

5 许钧、袁筱一《当代法国翻译理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09页。

6 Eugene A. Nid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Leiden: E. J. Brill, 1964, P. 15.

7 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0页。

8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79页。

9 同上，第81-82页。

占当时翻译理论的鳌头”。¹ 后来，坎贝尔（George Campbell）和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又带来了理论突破。坎贝尔将《圣经》翻译分为文学和宗教两种目的，从更广的视角去认识宗教翻译的社会功能，为《圣经》翻译采用不同方法的合理性提供了解释，从而让人们认识到，即使针对相同的文本，也需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以适合不同的翻译目的。泰特勒被认为是世界译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² 他于1790年发表的《论翻译的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被普遍视为西方翻译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完善的翻译理论专著，所提的翻译三原则传播甚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近代法国翻译理论分为两派，崇古派坚持忠实准确的翻译原则，厚今派认为译者有必要改变和超越原作。阿布朗古尔（Perrot d'Ablancourt）和戈多（Antoine Godeau）是厚今派代表，前者主张为取悦读者美化译文，后者强调翻译要适应时代标准，发挥译语的表现能力，取得效果的忠实。他们的观点与当时法国弘扬民族语言的需要相呼应，有着鲜明的民族立场。梅齐利亚克（Bachet de Meziriac）则反对不忠的翻译，认为译者不得有任何增添删减、歪曲改动。³ 于埃（Pierre-Daniel Huet）也坚决反对自由翻译，认为译者应专注于展示原作，不能用自己的语言魅力去欺骗读者。⁴ 于埃较为全面地探讨了翻译的基本原理，受到了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高度评价，⁵ 他对翻译的广义界定展现出阐释学派翻译理论“翻译即阐释”和“理解也是翻译”的最初形态。他还认识到了翻译所涉语言有着不同的位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矛盾与语言之间的地位关系相关。坦德（Gaspard de Tende）和巴特（Charles Batteux）则通过语言分析将抽象的翻译原则落实到了翻译的语言转换过程中应遵循的规则上，他们将翻译中的语序安排、句子结构、衔接手段、句式、篇幅、修辞、谚语、词性转换和词语组合等全都纳入考察，具有明显的应用理论特征。

近代德国的翻译理论也有较大的发展。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歌德、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等取得了赫然的理论成就。洪堡特提出了语言决定思维的观点，给两个世纪后的沃尔夫假设理论提供了依据，也给翻译的不确定性和不可译性论埋下了伏笔。⁶ 赫尔德认为民族文学的发展十分需要翻译的帮助。歌德也十分重视文学翻译的历史作用，认为翻译是

1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85页。

2 同上，第132页。

3 许钧、袁筱一《当代法国翻译理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21页。

4 D. Robinson,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 (2nd edi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 164.

5 G. Steiner,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P. 248.

6 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1页。

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活动之一。¹ 他积极肯定翻译对民族文化和文学的影响，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提倡以尊重语言差异的翻译促进世界文学的发展。施莱尔马赫系统地阐述了翻译的本质和翻译理解中的语言和心理问题，总结了异化与归化问题的内涵与关系，修正了相对主义的语言观和翻译观，开创了翻译理论的阐释学派。洪堡特则非常强调语言的民族性、语言与民族精神的联系，认为语言具有不可译性，但人类思维的普遍联系和共同规律使得语言间的翻译得以进行。

20世纪后半叶，西方翻译理论又掀开新的一页，语言学翻译理论逐渐成为主流。奈达（Eugene A. Nida）倡导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问题，倡导以句法结构分析、语义成分分析和核心句分析等方法，对翻译过程中的语言结构和语言转换程序进行分析，追求译文与原文的功能对等。奈达的翻译科学说、翻译交际说、动态对等说、翻译功能说、四步模式说等²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雅各布森于1959年在《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中论述了翻译的语言符号活动本质，以及翻译与语言的关系问题，第一次将符号学引进了翻译研究，³ 奠定了翻译语言学派的符号学理论基础。⁴ 卡特福德（John Cunnison Catford）于1965年出版了经典之作《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阐述了翻译所涉的语言成分、类别、对等、限度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较完整的翻译转换理论。穆南（Georges Mounin）讨论了翻译和语义、语法的关系，指出句法关系可以作为翻译理论的基础。⁵ 莱斯（Katharina Reiss）提出了以语言的文本功能分类为基础的翻译理论，开创了翻译理论的功能学派。费道罗夫（A. V. Fedorov）、什维采尔（A. D. Schweitzer）、列茨克尔（Recker）、巴尔胡达罗夫（L. Barkhudarov）、切尔尼亚霍夫斯卡娅（Chernjahovskaja）、科米萨罗夫（V. N. Komissarov）等也相继出版了语言学翻译理论著作，苏联的翻译理论由此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20世纪80、90年代是西方翻译研究的学科体系发展时期，翻译理论研究热点频呈，流派纷立，理论思想发生重要变化并实现多元化。翻译理论研究空前繁荣，翻译思想异常活跃，翻译理论著作极为丰富，甚至丰富到任何概括和分类都会显得有些苍白、片面的程度。⁶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继续受到重视，弗米尔（Hans J. Vermeer）和诺德（Christiane Nord）提出了翻译目的论，代表着功能学派翻译理论的关切点由文本内走向文本外。

1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05-106页。

2 同上，第230-240页。

3 潘文国《当代西方的翻译学研究——兼谈“翻译学”的学科性问题》（1），《中国翻译》2002年第1期，第31页。

4 陈浪《当代语言学途径翻译研究的新发展——语篇·斡旋调解·语境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19页。

5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98页。

6 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豪斯 (Juliane House) 则借用韩礼德的话语分析理论, 发展出了一套侧重语用交际效果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哈蒂姆 (Basil Hatim) 和梅森 (Ian Mason) 也从语用交际角度考察翻译, 他们将话语分析、社会文化分析和文本功能分析结合起来, 提出了语境翻译模式。格特 (Ernst-August Gutt) 则以关联理论为基础, 提出了最佳关联假说, 以解释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心理过程。

当西方翻译学者走出结构主义语言学框架, 走向功能和交际的理论考量时, 文化学派翻译理论也随“文化转向”兴起。巴斯奈特 (Susan Bassnett) 和勒菲弗尔 (André Lefevere) 是这一学派的标志性人物, 他们或单独或合作发表著作, 引领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一书中, 强调了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对翻译行为的操控, 提出翻译是一种改写活动的观点, 学界将之冠以“操控论”和“改写论”。赫曼斯 (Theo Hermans)、兰伯特 (Jose Lambert) 等将操控论发展得更为深入, 他们通过实证研究揭示出在某些现实语境下对等翻译的虚幻性和欺骗性, 为文化翻译理论增添了重要的理论内涵。¹ 描写翻译研究也在同一时期兴起, 图里 (Gideon Toury) 对描写性研究方法进行了理论化阐释, 提出翻译规范概念。切斯特曼 (Andrew Chesterman) 则从职业和行业角度对翻译规范进行了新的分类阐发。

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风行, 一些学者将解构主义哲学引入翻译研究, 开始了对一元中心思维定势和确定性意义观的解构, 还有一些学者则从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角度思考翻译的颠覆性力量。韦努蒂是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积极倡导者, 他在《对翻译的再思考》(*Rethinking Translatio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Ideology*)、《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翻译的丑闻》(*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三部著作中批判了以民族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价值观为指导的“归化”翻译原则, 提倡以“异化”的翻译策略作为抗阻文化霸权的手段, 破除透明翻译的传统。斯皮瓦克 (Gayatri C. Spivak)、尼兰贾纳、霍米·巴巴 (Homi Bhabha)、罗德格 (Douglas Robinson) 等是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 他们把翻译和政治联系在一起, 剑指欧洲中心主义, 探讨弱小民族以翻译为手段反抗殖民文化的问题。戈达尔德 (Barbara Godard)、雪莉·西蒙 (Sherry Simon)、弗洛托 (Luise von Flotow) 则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代表学者, 他们从女性与男性的关系角度认识翻译中译文与原文的关系, 反对原文中心主义的翻译观, 倡导译文与原文的平等地位, 提出了在翻译中颠覆男性话语、彰显女性修辞的主张。

1 杨镇源《翻译学元理论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2年, 第45页。

（二）中国翻译理论的历史发展

中国翻译理论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末期，人们对翻译的功能和专名翻译的原则就有了朴素而重要的认识，《大戴礼记·小辨》中的“……传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谓简矣”和《春秋谷梁传》中的“孔子曰：名从主人，物从中国”等可视为萌芽状态的译论。前者说明当时的人们已认识到“翻译能够迅速沟通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的隔阂的作用”；¹后者表达了“专有名词翻译的完整原则”。²

佛经译论是我国传统译论中极具代表性的部分。支谦的《法句经序》是最早的系统性译论，该序首次提出了译事之不易，³指出了翻译困难的源头，对前人翻译进行了评点和总结，明确地提出了作为翻译原则的主张，还提出了面对翻译中语言文化差异带来无法解决的困难时可采取的权宜之策。道安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是另一篇译论经典，该序对影响翻译忠实的因素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僧睿的《小品经序》论述了翻译中的名实关系，是将中国传统哲学的名实观引入翻译理论的重要尝试。僧祐的《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对翻译所涉的同音同义异形字、新旧译名不同而意义相同等现象进行了概括。彦琮在《辩正论》中提出了“八备”，⁴对译者应有的能力和素养做出了全面的规定。此外，还有赞宁的《译经篇总论》提出了“六例”说，归纳了译经中的特殊情况及解决各类矛盾的方法。⁵

我国古代除了佛经译论之外，还有着不容忽视的普通译论。在贾公彦和孔颖达等对经典的注疏中，就蕴含了很多有关“何为翻译”的理论认识，包括翻译工作的重要性、翻译工作的目的与功能、翻译的工作内容、翻译的标准、翻译的文化背景、翻译的性质等。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和中国本土学者一起开展了科技翻译活动，也发表了对翻译的重要看法。如徐光启提出了翻译“会通”论，指出翻译是会通中西、为我所用、实现超越的必要举措。另外，清代专事汉满翻译的魏象乾提出了“正”译标准，强调翻译要充分了解原文意义，使译文具有与原文相同的修辞效果，顺应原文的衔接连贯，传达原文的风格神韵等。

鸦片战争之后，学者们积极发表有关翻译目的、功能、组织和人才培养的论述，力图通过翻译寻求救亡图存之路。冯桂芬、马建忠、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吴汝纶、林纾、蔡元培、高凤谦、罗振玉、王国维、周桂笙、徐念慈、章士钊、胡以鲁、胡怀琛等

1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页。

2 赵巍《中国传统译论中的“意识形态”——从“名从主人，物从中国”谈起》，《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70页。

3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页。

4 人们也将“十条”归纳为彦琮的理论贡献。有关“十条说”，陈福康认为是彦琮“引述道安的论点，而非自己的创见”。笔者赞同陈福康的观点，因而此处只讨论“八备”。

5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1页。

以各类序跋、奏表、杂文等发表意见，或撰写专论翻译的文章，如蔡元培的《译学》、章士钊的《论翻译名义》和胡以鲁的《论译名》等。这些作品主题和观点明确、理据充分、思考深刻。清末学者的译论贡献，以严复的“信达雅”论影响最为深远。虽然该论以译事三难提出，但其蕴意丰富，一直被视为我国传统译论中最突出的代表，受到无数的解读，也经常被拿来与英国翻译理论家奈特的三原则相比较。

民国时期，许多著名的文人学者都参与了对翻译的讨论。他们对于翻译作为强国之策有着十分强烈的意识，论述了翻译的语言创新功能、文学创新功能、思想革命功能和社会建构功能，并结合出版和传播来讨论翻译的具体问题，对翻译进行了各种类别的划分。他们讨论的主题除了翻译的价值与功能之外，还有翻译选材、翻译原则、翻译与创作的关系、译者（翻译批评者）的资质条件等，讨论的对象以文学作品的翻译为主，包括诗歌的可译性、文学翻译的策略和方法等。这时已经出现了专门的翻译论著，如蒋振翼的《翻译学通论》、吴曙天的《翻译论》、黄嘉德的《翻译论集》、杨镇华的《翻译研究》、张其春的《翻译之艺术》等。

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我们还处于传统译论阶段。这一时期代表性翻译学者有董秋斯、焦菊隐、茅盾、傅雷、钱锺书等，最为人称道的译论是傅雷的“神似”论和钱锺书的“化境”论，两者合为“神化说”，¹被誉为中国传统译论发展的归结点和巅峰。董秋斯的突出贡献在于明确翻译理论建设的重要性，提倡开展翻译批评，提出建设翻译学的主张。茅盾强调了译介世界各国文学作品的重要意义，提出文学翻译工作必须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指出了文学翻译工作者的责任和对翻译工作水平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十分重视翻译理论的对外交流。改革开放前重点引介苏联翻译理论，1980年代后转向以欧美国家的翻译理论为主，其中以奈达、纽马克（Peter Newmark）和卡特福德为代表的语言学翻译理论在引介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1990年代外国翻译理论引介的全面性、多样性、系统性与批判性增强，引介的方式由翻译和转述变为评述和阐释，引介的重点也由语言学翻译理论逐渐转为文化翻译理论和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理论来源地也从英美扩及德国、法国和低地国家，并开始从宏观层次关注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的整体脉络，也按国别进行了分类研究。进入21世纪的前十年，引介呈现出更加动态多样的特点，各学科途径、各流派、各具体研究领域的翻译理论纷纷登场，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食人主义、权力话语、场域等理论话语在翻译研究中层出不穷。

随着学科建设任务的变化，我国译学界也日渐加强了基础翻译理论的研究。新时期，翻译研究者对翻译的原则和标准进行了大量的探讨，辜正坤的“翻译标准多元互补

1 朱志瑜《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神化说”（前期）》，《中国翻译》2001年第2期，第3页。

论”¹就是其中代表性的成果。译界也先后就可译性、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等话题展开争鸣，讨论范围扩大到了翻译本体、翻译客体、翻译主体、翻译受众、翻译的社会和文化功能等，既对翻译的言语转换活动、社会话语实践活动，以及心理思维活动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也致力弄清翻译的各种社会文化影响因素及其矛盾所在。以许钧为代表的学者对翻译本体问题进行了哲学层面的探讨，形成了有关翻译基本原理的系统性认识。许钧的代表作《翻译论》把对翻译活动进行内部的、纵向的微观分析引向内外联系的、动态的宏观考察，把对翻译的语言符号层面的研究引向对翻译的社会文化层面的探讨。作为“理论的先锋”，²该著论述了翻译的本质、过程、意义、因素、矛盾、主体、价值与批评，“破解译学七大难题”，³是对翻译基本问题的一次全方位的论述。

中国翻译学者也一直在进行着跨学科翻译理论建构的努力。谢天振开创的译介学就是翻译学跨域开拓的重要成果。作为翻译学与比较文学的交叉研究，译介学并不以指导翻译实践为目的，而是在接受翻译行为的实然结果、摆脱对译作的好坏判断的基础上展开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考察和分析，它关注原文经由翻译之后产生的信息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现象，力图揭示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生态翻译学也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吸引了众多年轻学者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框架开展研究。该论以生态喻指翻译中主体与环境的关系，以翻译文本生态、翻译群落生态、翻译环境生态为研究对象，致力发掘翻译文本和翻译活动中的生态理性和生态意义。

体现中国学者积极构建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的还有变译论、译者行为批评、知识翻译学等。变译理论区分变译与全译，界定了变译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将零星的变译方法范畴化、系统化，旨在描写变译现象的发生动因、变译过程的运作机制、变译主体以及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变译结果的文本特征，揭示变译的实质、要素、手段、方法、单位及其价值。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倡导将翻译主体的意志性、翻译活动的社会性、翻译过程的复杂性以及翻译文本的生成性纳入视野，开展对译者行为和译文质量、译者行为和社会服务等互动关系的批评和研究，对翻译文本生成的译内环境和译外环境、译文的译内效果和译外效果、译者的语言性和社会性、译者的语言人身份和社会性角色、翻译和非译以及译者行为合理性进行描写和解释。知识翻译学从知识论角度认识翻译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翻译的跨语知识生产、创新和传播等的研究。作为新生的译学理论，知识翻译学所针对的是知识和翻译之关系问题，它既从知识角度看翻译何以发生

1 辜正坤《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中国翻译》1989年第1期，第16-20页。

2 吕俊《一部值得认真研读的译学力作——读许钧教授新作〈翻译论〉》，《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年第4期，第61页。

3 伍小龙、王东风《破解译学七大难题——评许钧教授的新作〈翻译论〉》，《中国翻译》2004年第4期，第52页。

和存在，也藉翻译看知识何以转化、迁移、传播、创新和应用，从而增添了认识翻译本体的一个维度，也为理解人类思想性存在引入了一个新的角度。知识翻译学围绕着“翻译是知识”和“知识的地方性和翻译的世界性”等命题形成了理论场域，吸引和汇集了一批认同者，构成了相关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此外，学者们还在积极开展翻译学分支领域的理论研究。在文学翻译理论建构方面，学者们在继承传统和借鉴外国的基础上不断深化研究，发表了数量众多的论文，出版了不少理论专著。许渊冲就是成就不凡的一位，他提出了极具特色的“三美论”“三化论”“三之论”“翻译艺术”“发挥译语优势论”“三似论”以及“竞赛论”等，突破了传统译论中的原文中心主义观点，提高了译者作为创造者的身份和地位。随着非文学翻译实践活动的增多，应用翻译理论研究随之在法律、旅游、商贸、科技等许多领域展开。方梦之做出了先驱性的贡献，其译学思想为我们确立了以实践为导向建构应用翻译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原则：1) 按照现实来认识翻译理论的应用性和应用翻译的理论性；2) 贴合实践发展应用翻译的理论话语；3) 基于实践丰富应用翻译的理论内涵；4) 立足本来，坚持整体的、发展的、一分为三的思维方法。¹ 翻译批评也是我国翻译理论学者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自1992年许钧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开山面世之后，又有杨晓荣、胡德香、王宏印、文军、温秀颖、吕俊、肖维青、周领顺、刘云虹等的翻译批评理论著作出版，尤其是2015年刘云虹的《翻译批评研究》将我国翻译批评的系统化理论建构又推进了重要一步。在方法论研究方面，黄忠廉、李惠红、穆雷、仲伟合、姜秋霞、蓝红军等的著作将译学方法的元理论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我国的翻译研究取得了显著的理论成就。翻译学者不断拓展理论视野，升华理论目标，坚持进行着理论建构方法的批判性反思，研究中的理论话题逐步多元分化，理论关切点发生过多转移和变化，理论的现实性、应用性和实践性功能也不断增强，这些都使以翻译理论为核心和主要标志的翻译学知识体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二、翻译理论的类别与功能

翻译理论，因其观照的对象（翻译实践）本身意指丰富，一直处于不断发展中。加之人们的认识在积累和深化，从双语转换到语内、语际和符际翻译三分，从关注怎么译，到关注何为译、译何为、谁在译、什么影响翻译、如何评价翻译、如何进行翻译教学等，意味着翻译理论是一个不断发展壮大、日渐丰富繁复的知识库。对复杂多样的翻译理论进行类别划分就是翻译学知识体系建构的任务之一。

1 蓝红军《应用翻译理论体系建构的方法论原则——方梦之译学思想的启示》，《上海翻译》2020年第6期，第13页。

(一) 翻译理论的类别

有关西方翻译理论,一些学者以范式、学派或流派进行过划分。根茨勒(Edwin Gentzler)将当代西方译论划分为美国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系统派和结构主义派五个流派。¹谭载喜1991年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分为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美国结构主义学派、交际理论学派以及苏联的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²而后于2004年又按地域将之梳理为中欧、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低地国家及以色列等地、苏联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³提莫志科(Maria Tymoczko)将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翻译研究的主要流派分为:翻译工作坊方法、哲学和语言学方法、功能主义流派、描述翻译学、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翻译观、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学派等六种。⁴芒迪(Jeremy Munday)将西方翻译理论分为九种类型:等值和等效理论、翻译转换方法、翻译的功能学派、话语及语域分析方法、系统理论、文化研究的类型、异化翻译、翻译的哲学理论、跨学科的翻译研究。⁵刘军平将之分为翻译的语言学派、文艺学派、哲学学派、功能学派、多元系统及规范学派、目的论学派、文化学派、女性主义翻译观、后殖民翻译理论等。⁶

而对于整个学科的翻译理论,学者们也做过各种划分。霍姆斯(James Holmes)在其翻译学结构图中,将翻译理论分为一般理论和专门理论。⁷罗杰·贝尔(Roger Bell)因翻译一词多义的特点,将翻译理论分为有关翻译过程的理论、有关翻译产品的理论以及有关翻译过程和产品的理论。⁸韦努蒂赞成将翻译理论根据不同的语言用途假设划为两类,一种是“工具性的”(instrumental),一种是“阐释性的”(hermeneutic)。前者视翻译为对原文形式、意义或效果的忠实再现,后者视翻译为一种改变了原文形式、意义和效果的阐释。⁹王宏印以现代语言学根基为界,区分了传统翻译理论和现代翻译理论,并认为,判断一个翻译理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主要依据是其理论兴趣、理论问题、理论方法、理论形态。¹⁰谭载喜则按照学科来源将翻译理论划分为翻译的语言学理论、文艺学理论、交际学理论、社会符号学理论、心理学理论、机器翻译的理论和综合

1 E. Gentzler,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2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

3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4 参见马会娟《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概况——兼谈Maria Tymoczko的翻译观》,《中国翻译》2001年第2期,第61-65页。

5 J. Munda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6 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

7 J. Holme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ed. L. Venuti,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172-185.

8 R. Bell,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p. 26.

9 L. Venuti,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5.

10 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页。

性理论等；¹ 吕俊、侯向群将翻译理论分为与实践检验相联系的应用性理论和与形式结构相联系的纯理论；² 尹铁超则将翻译理论划分为技术层面和认识论层面两类，认为前者是通过翻译实践（方法）的归纳而得出的，而后者是通过语码转换的可能而建立起来的对人类语言本质的思考。³

这些对翻译理论分化、细致化的认识，是人们对翻译认识深化发展的体现，它反映出翻译理论从关注翻译方法到关注翻译本体、翻译主体、翻译功能的范围扩大，以及从关注实践性、规范性到关注形式性、描述性的类型延展。此外，我们还可以根据建构特征和理性基础将翻译理论划分为规范性翻译理论、哲学性翻译理论、结构性翻译理论和经验性翻译理论等四种。

规范性翻译理论并非描写翻译研究中关于翻译规范的理论，而是指有关翻译行为伦理取向的理论，规范性理论研究主要基于价值判断对人的翻译行为和人本身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回答“翻译应该怎样”的问题。规范性理论不是对现实状态的描写，而是对理想状态的设定，其客观性主要表现为主体间的共识客观性，是人们认同、向往和追求的标准，不具有可重复性或可验证性，如信达雅论、三美论、功能对等理论等。

哲学性翻译理论则产生于对研究对象的哲学存在进行形而上思辨，它看似讨论翻译而实际上与翻译实践不直接相关，主要回答“翻译本质是什么”“语言是否可译”“译作与原作是什么关系”等问题。和其他哲学性理论一样，哲学性翻译理论不属于科学的范畴，无法证实或证伪。这一类型的理论研究是对翻译所涉主体、客体、主客体间以及主体间关系等问题寻根究底的反思，如改写论、不可译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等。

结构性或体系性理论是人们用来感知和解释社会实践的一种认知结构。体系性翻译理论研究以其他理论为基础，运用系统思维，关注翻译所涉各系统内部结构的合理性，主要回答翻译学“由什么构成”的问题。这类理论陈述某种翻译存在的结构体系，是一系列构成要素逻辑关系的展现，不受制于可重复性的标准，而受制于合理与否的评价和认同，如翻译能力构成理论、霍姆斯的翻译研究路线图等。

经验性翻译理论是基于对可感知的事实和材料的描写和分析的理论。经验性翻译理论研究强调以切实可靠的经验材料或客观数据来揭示翻译现象和翻译行为的原因和影响，它回答翻译“是怎样”的问题，以规则、规范与规律性特征描写及流程模式构建为目的，并不先入为主地规定翻译应当怎样，而是求证翻译可以怎样和实际是怎样的。这类理论通常以科学程度较高的学科（如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等）为背景，以实证主义方

1 谭载喜《翻译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4页。

2 吕俊、侯向群《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5页。

3 尹铁超《翻译理论类别与翻译实践相关性研究》，《外语学刊》2012年第3期，第109-112页。

法论为指导来建构，以可验证性、可重复性为标志，不受学派认同与否的影响，如口译场合互动模式、翻译质量评估模式等。

规范性翻译理论和哲学性翻译理论更为主观，方便对事物获得整体认识，经验性翻译理论和结构性翻译理论强调客观，但着力于微观或静态结构，因而不容易体现社会翻译现象和人的翻译行为的复杂性。哲学性翻译理论适合于对普遍翻译现象进行共性解释，经验性翻译理论适合于对具体翻译选择进行个性解释。规范性翻译理论适用于译者群体社会性翻译行为的倾向性解释，而结构性翻译理论适合于对某一系统的内部构成或某一类型行为有影响的多因素解释。这四类理论有不同的功能指向和不同的理性特征，但并非截然相异，而是互相关联，互为基础或互为补充。

（二）翻译理论的功能

理论有其功能，这是一种常识。人们之所以研究理论，就是因为理论能为我们提供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¹ 翻译史学者路易斯·凯利（Louis G. Kelly）曾指出，完整的理论应由三个部分构成：1）功能和目标的说明；2）操作的描述和分析；3）对目标和操作之间关系的评论。² 格特就对其关联翻译理论进行了功能说明：“既非描写性的，也非规定性的，而是解释性的”。³ 这说明，译学界已将翻译理论的功能说明视为理论的组成要件之一。实际上，当人们发出“翻译理论有用吗？”的疑问时，质疑的往往不是翻译理论是否有用，而是某个翻译理论是否对翻译实践有用。我们需要认识清楚的是，翻译理论可以或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刘宓庆1999年在其专著《当代翻译理论》中提出要建立翻译理论的功能观，指出翻译理论有认知功能、执行功能和校正功能，⁴ 而后又在2005年的《新编当代翻译理论》中将翻译理论的功能扩充为认知功能、执行功能、校正功能和提升功能。⁵ 吕俊2003年在参与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大讨论时专题讨论了翻译理论的功能，他认为翻译理论有六大功能：认识功能、解释功能、预测功能、方法论功能、批判功能和对实践的指导功能，⁶ 这一观点后来又得到进一步重申和细微的修改。⁷ 何三宁则在吕俊观点的基础上将翻译理论的功能概括为验证功能、解释功能、反哺功能、方法论功能、操作功能等五

1 此观点来自哲学学者孙正聿讲座视频《理论及其功能》，具体参见<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11417459>, 2017-06-18。

2 L. G. Kelly, *The True Interpreter: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West*, Oxford: Blackwell, 1979, P. 1.

3 E-A. Gutt 《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第200页。

4 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年，第2-4页。

5 刘宓庆《新编当代翻译理论》，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年，第2-5页。

6 吕俊《翻译理论的功能——兼析否认理论的倾向》，《上海科技翻译》2003年第1期，第3-4页。

7 吕俊、侯向群《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6-51页。

种。¹可见翻译理论的用处并不仅限于指导实践。如果我们将翻译理论之用仅仅定位于实践之用，实际上是矮化了翻译理论研究的贡献。另外，理论具有多种功能，并不意味着任何理论都是万能的。如果用描写实然现象功能的理论去指导实践，则必然会导致“该理论无用”的误解。目前翻译界还较为普遍地存在着误解、误用、套用理论的现象。

鉴于翻译理论所具有的多种功能，中外学者对于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无不强调。皮姆指出，开展翻译理论研究，可以在翻译没有现成答案、需要创造时，提供帮助；能引发有益的思考，带来新颖的答案；是翻译实践变化的重要动因；帮助人们意识到翻译的复杂性，提升译者形象地位；为翻译从业者提供论争理据和多种翻译可能。²孙艺凤也指出，理论探索的过程本身可以带来许多的启迪，可以拓展翻译学的视野和范围，促进学科发展，加深对翻译活动的理解，或是对相关问题做出更合理的解释或提供更好的答案。³许钧一直致力于翻译理论研究，他认为，正是由于我们在翻译理论认识方面取得的进步，为学科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深化了外语学科的内涵，促进了翻译人才的培养，加强了人们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理解，也有助于提高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⁴应该说，译学界已经认识到，开展翻译理论研究不仅对于个体译者、翻译机构、翻译行业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对于翻译学科和相关学科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它有助于个体突破自身经验局限，提高翻译实践能力，缩短进入职业角色的适应期，塑造译者的身份与形象，改善翻译的社会地位，也是翻译学科进行知识积累、传承和更新的必要途径。它不仅有助于夯实自身的学科基础，还有助于社会认识翻译，提升翻译的社会地位，提升翻译学的学术话语权。

概言之，理论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层次，执行着不同的功能。不同理论的应用对象和方式不一样，理论价值的大小会因时、因地、因人、因学科的不同而有所差别。⁵指导实践只是理论的功能之一，直接用于指导实践的理论，在学科理论体系中一般居于较低层次，它们与实际操作有更为密切的关系。⁶居于抽象、宏观层次的翻译理论，离实践距离更远，并不能直接指导翻译实践、提高翻译工作效率。这一类理论需要进一步进行操作化界定之后，才能与翻译实践进行衔接。不同类别的理论，指导实践的方式不同。应用翻译理论可以总结、归纳、提升和修正翻译经验，在更高的层面上形成原则或程序指导翻译实践；而纯翻译理论则能帮助人们形成一定的翻译观，一方面提供认识、解释和预测翻译现象的工具，另一方面提供方法论，用来修正应用翻译理论，进而修正

1 何三宁《翻译多元论实证分析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25页。

2 A. Pym, *Exploring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4-5.

3 孙艺凤《视角 阐释 文化：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14页。

4 许钧《翻译研究之用及其可能的出路》，《中国翻译》2012年第1期，第5-12页。

5 覃江华《翻译理论的本质、价值与危机》，《外语学刊》2020年第5期，第58-64页。

6 吕俊《翻译理论的功能——兼析否认理论的倾向》，《上海科技翻译》2003年第1期，第3-4页。

翻译经验，从而指导翻译实践。¹ 虽然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距离有远有近，但从根本上来说，翻译理论都以某种知识图景和思维方式，规范着我们在翻译实践中的价值选择，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我们的翻译实践。

第三节 翻译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

当前，翻译学进入了新的建设阶段，它将和其他学科一道承担起建设“理论中的中国”的历史使命，翻译学者需和全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起，以“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² 谋求自身的理论发展。翻译的复杂性和历史性决定了翻译理论研究的开放性和发展性。进入新的阶段，翻译必须承担起促进人类多元文化交流的功能，在弥合观念和立场差异之中发挥独特的价值。翻译理论研究者应该把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自身发展的背景，力求生产出为翻译实践发展服务、同时反哺其他学科的翻译理论。

一、翻译理论研究需要重视实践问题

翻译在未取得独立的学科地位之前，整体上是一个重实践而轻理论的时期。有学者认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翻译理论，在西方的古典时期并不存在。³ 中国传统译论也被认为是理论意识不强，以实践理性为主导。⁴ 20世纪60至80年代是西方理论的黄金时代，雅各布森、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一批思想巨人带来了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重大理论成果。理论繁荣显然也影响了翻译领域。在此期间，新的翻译理论频出。西方翻译理论传介至中国，也促成了中国译界人士对翻译理论前所未有的重视，各类期刊中已经难能见到只谈翻译实践（“缺乏理论支撑或理论深度”）的论文，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翻译理论研究对翻译实践的忽视。

当翻译进入“职业化时代”，以往的理论明显不足以解释新时期翻译何以可能的问题。譬如，在既有的翻译理论体系中译者是整个翻译过程的中心，传统的翻译活动是围

1 穆雷《也论翻译研究之用》，《中国翻译》2012年第2期，第5-11页。

2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参见<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19/c1024-28361447.html>。

3 L. Venuti,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13.

4 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7页。

绕译者而展开的，翻译学建立起了一系列以译者为中心的理论概念，如翻译目的、翻译选择、译者主体性、译者风格、译者能力、译者惯习、译者行为等，基于对译者的认识建构出目的论、改写论、操控论、译者隐身论、视域融合论、翻译适应选择论、译者行为批评论等理论。但现在的翻译实践活动中有可能难以找到既有理论体系中的“译者”。当一个完全不懂外语的人借助网络或软件进行翻译时，“谁是翻译的主体”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是软件使用者？软件？软件提供者？还是软件开发者？当机器在互联网的数据“云”中为你抓取与原文匹配的语块时，译者在哪儿？翻译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而译者却不在场，既有理论对此似乎无法提供有效的解释话语。

翻译主体的变化还带来了翻译伦理的困惑。传统的翻译伦理研究通常关注译者个人的伦理行为，而在当今技术条件下，译者并不一定在场，译者个人伦理行为的影响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其他相关人员的伦理行为也会对翻译伦理产生影响。传统的翻译伦理强调译者自律，即依靠译者内在设定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标准的引导，而非凭借某种外部规范的约束。但“职业化时代”翻译的技术性增强，翻译伦理行为变得更加复杂多样，对翻译活动发生作用的伦理规范除了政治规范和语言规范之外，还有技术规范和商业规范，能够约束译者行为的伦理规范不一定对其他翻译伦理行为主体产生作用。翻译伦理体系亟需建立一种负反馈机制，明确各行为主体的责任，使翻译伦理行为成为一种可及时调整的行为。此外，随着翻译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加大，翻译伦理关怀范围的外延也需要调整和扩大。

需要改写的远非只有对翻译主体的认识，翻译的客体、翻译的过程和翻译的标准等都需要重新界定。例如，当“狗语翻译机”出现时，我们颇难解释作为人与狗之间交流工具的“翻译”究竟属于语际翻译、语内翻译，还是符际翻译，“狗语翻译”活动所及的客体对象除了人的语言，还有狗的“语言”，问题是语言是作为“人类交流工具”定义的，如果我们藉由翻译实现了物种之间的交流，那么翻译的发生条件除了“跨语言、跨文化”之外，还可以加上“跨物种”，但是跨物种交流是否同时也是跨文化的呢？

时代的发展使得既有理论的解释力变得不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翻译实践的发展对翻译理论研究展现出新的价值诉求，蕴涵着更深层次的理论期望。翻译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期，诉诸一般、远离实践问题的翻译理论研究已不合时宜；真实问题驱动是翻译理论的必然走向。这就要求翻译理论研究主动走近实践问题，关注翻译实践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实现理论的创新发展。当前的翻译本质讨论、多模态翻译研究、口笔译能力构成及评估研究、翻译语料库建设及应用研究、国家翻译实践研究、“走出去”翻译研究、网络翻译批评研究等，都是理论研究对实践问题的部分回应。可以预见，未来的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关系将更为密切。

二、翻译理论研究需要拓展理论资源

理论发展离不开理论资源。中西会通、古今互鉴、多元融合是翻译理论发展思路，这意味着译学理论发展可以有也应该有多种资源：国外译论、中国传统译论、相关学科的理论、翻译史、当今翻译现实等。过去，我们曾存在太依赖西方译论的情况，现在，翻译理论研究又呈现出发展缓慢的趋势。反思之下，不难发现这都反映出我们在理论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的问题，这无疑是新时期译学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论从“实”出，变化中的翻译现实是翻译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职业化时代的翻译日新月异，翻译活动所涉的主客体关系不断发生变化，描写和解释新的翻译现象，较为全面和准确地认识和把握翻译的本质和规律，只能依靠翻译学者。探索翻译基本问题，不能寄望于外来的力量，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只能提供新的认识视角，却不可能替代对翻译现象的描写和对翻译事实的发现，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翻译自身的问题。令人高兴的是，已有不少学者在新的历史视野中开始了这样的工作，他们从各种角度关注既有理论不能充分解释的问题和现象，如穆雷、滕梅、黄立波等对翻译政策的研究，崔启亮、王少爽、王华树等对翻译技术发展和翻译行业管理的关注等。

其次，论从“论”出，翻译理论研究要充分利用好中国传统译论这一资源。继续学习和借鉴外国理论是译学应有之义，而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译论也是译学界的普遍共识。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王宏印的《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朱志瑜和朱晓晨的《中国佛籍译论选集评注》、张思洁的《中国传统译论范畴及其体系》、张佩瑶的《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吴志杰的《中国传统译论专题研究》、赵巍的《中国传统译论的社会文化阐释》等对传统译论进行过系统的梳理、评注、阐释和体系分析。但相对而言，我们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研究还十分不足。重视传统译论，是为了使之在现代语境中焕发出新的生命，我们可做的工作有很多，如：1) 从传统译论中汲取思想，用现代理论话语重释原来的理论；2) 对传统译论进行类别划分，使之对应不同类别和不同层次的翻译基本问题，整合同类、补充缺项，建构原本隐含的体系；3) 在传统译论基础上拓展，使其边界延伸向新的领域，扩大其解释范围；4) 寻求某种框架将传统译论和现代译论融合在一起，以产生新的理论，解释新的翻译现实。

另外，论从“史”出，我们还需充分发挥好翻译史的理论建构功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翻译史研究成果丰富，有数十部翻译史著作问世，其中不乏精品和力作。目前我们已基本了解了历史上有哪些翻译事件、翻译主体、翻译产品以及翻译思想，但对于历史上的翻译是如何存在的，翻译形态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具体翻译事件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具体翻译活动中各要素之间呈现出什么样的关系，具体翻译活动与翻译事件是如何影响相应的历史发展进程，以及历史上翻译为何如此存在，翻译形态、翻译对

象、翻译主体、翻译思想的历时变化有何规律，这些规律反映出翻译的何种本质等问题还有待更深入地研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无疑就是为翻译基本理论的建构提供史学资料。这些基础研究做好了，译学基本理论的面目也将变得更为清晰。

思考题

1. 你知道的有关翻译的比喻和翻译定义有哪些？这些比喻和定义蕴含了怎样的翻译观？
2. 探寻翻译本质的意义何在？
3. 找出两种不同类型的翻译作品，试比较其不同的价值。
4. 如何理解翻译的工具价值和人文价值？
5. 中国传统译论是不是翻译理论？为什么？
6. 现代翻译理论一般对理论有怎样的要求？
7. 举例说明翻译理论对你的翻译行为产生的影响。
8. 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出现疏离的原因是什么？
9. 为什么说翻译理论研究必须回归翻译本体？何为翻译本体？
10. 跨学科视角对于翻译理论研究而言具有何种价值？如何确保跨学科视角的翻译研究与翻译本体研究相一致？

推荐阅读书目

Cheung, Martha P. Y. 2006.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Buddhist Project*.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Cheung, Martha P. Y. 2016.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From the Late Twelfth Century to 1800*.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Delisle, J. & J. Woodsworth. 2012. *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 (Revised editio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Gentzler, E. 1993.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Munday, J. 2016.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4th edi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Newmark, P. 2001.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Pym, A. 2010. *Exploring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Robinson, D. 2014.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 (2nd edi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Snell-Hornby, M. 1995.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Revised editio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Steiner, G. 2001.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Venuti, L. 1992. *Rethinking Translatio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Ideolog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Venuti, L. 2000.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黄振定,《翻译学——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黄忠廉,《变译理论》,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刘宓庆,《新编当代翻译理论》,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吕俊、侯向群,《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谢天振,《中西翻译简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许钧,《翻译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许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概论(1978—2018)》,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8。

杨镇源,《翻译学元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赵巍,《中国传统译论的社会文化阐释》,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9。